

“托管”有人管 孩子不“饭难”

厦门校外“小饭桌”治理记

2017年前,全国各地大都未对校外“小饭桌”的规范化管理作出明确规定。监管存在盲区,食品安全难以得到有力保障,老百姓又对这类校外托管机构有巨大需求,不能“一关了之”。

犯难之际,一个社区的管理探索激发了灵感——

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的一家明黄门脸的店内,张雪兰在哄睡最后一个孩子后,下楼点开手机,屏幕随即跳出一段监控视频回放。

视频中,几个孩子围坐在餐桌旁,吃着黄瓜炒牛肉,喝着青菜排骨汤,手边是酸奶和应季水果;左下角的备餐区,一位阿姨把碗筷放进消毒柜,生、熟食摆进不同冰箱,身旁的台面亮洁如新。

“现在家长通过手机就可以看到自己孩子用餐的情况,方便又放心。”44岁的张雪兰是这家“优选托管中心”的负责人,每天都有三十多个小学生在这里吃午饭、睡午觉,家长和孩子们亲切地把这种托管模式称为“小饭桌”。

“小饭桌”考验基层治理智慧

“‘小饭桌’帮了大忙,让小孩省心、大人放心。”晚上8点,市民苏丽秋来到一家托管中心接孩子。虽然家离学校只有几公里,但她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,丈夫在轮渡公司上班,两人经常加班,加上家中老人身体抱恙,于是校门口的“小饭桌”成了她的优先选择。

时间往前推五年,厦门的家长要想寻着一家“让人放心”的“小饭桌”,可不容易。

“行业门槛低、主体资质不明、监管存在盲区……”思明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卢嘉新对此感受颇深。

记者采访发现,直到2017年前,全国各地大都未对该类主体的规范化管理作出明确规定;而且由于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涉及教育、卫生、市场管理等多个部门,管理职责不明确,校外“小饭桌”的食品安全难以得到有力保障。

“如果严格按照当时的规定,‘小饭桌’没有营业执照,都应该‘关门大吉’。”厦门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饶满华说,“但老百姓对这类服务有着巨大需求,一刀切取缔不现实。同时校外‘小饭桌’点多面广,靠突击式的查处治理,常常顾此失彼,效果并不理想。”

通过持续调研,厦门市场监管部门意识到,管好“小饭桌”,不能光靠一己之力,更不能“一关了之”。

犯难之际,一个社区的管理探索激发了灵感:自2009年起,思明区的金鸡亭社区便制定了《社区托管班考核评比量化表》,对辖区内“小饭桌”进行师资配备、经营场地、厨房设备和卫生等方面考核。

“每年年底我们都会召开一个表彰大会,宣布考评结果,授予优秀的‘小饭桌’奖牌。”金鸡亭社区书记姚丽雅说,“家长们很认这块‘牌子’,大大激发了经营者的积极性;同时,我们进行动态管理,后续发现有不合格行为的,采取摘牌



▲2022年11月2日,孩子们在思明区厦港街道的“优选托管中心”吃午餐。

◀2022年1月,在思明区梧村街道的一家“小饭桌”的大堂,可以看到后厨的实时录像。

▶2021年7月,协管员正在对一家思明区的“小饭桌”的刀具分类进行检查。

(均为受访者供图)



处理。”

经验表明,抓好建章立制,落细落实责任,结合社会共治,校外“小饭桌”可以管好。

为改变校外托管机构野蛮生长、监管无章可循的状况,厦门市政府办公厅2017年出台了《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外托管机构“小饭桌”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。该通知首次提出构建由“政府、监管部门、教育部门、家长和社区”共同参与的“五维共治”模式:即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,通过“学校摸底、镇街备案、部门评级、社会公示”的方式,改变以往“单一监管”的被动和乏力,尝试用市场机制倒逼“小饭桌”主动加强食品安全管理。

“每到开学前,先由学校搜集在校学生报名的‘小饭桌’名录,报备给社区进行‘摸底’,教育部门再把信息反馈给市场监管局,接着市场监管局派专员到店内实地检查、评级,最后通过学校将评级结果公示。”饶满华说。

2017年8月,经过多方联动,第一批涉及1597家小饭桌的评级名单被贴到了各大中小学校的门口。

“冰箱和消毒柜卖断货啦?”

在评级公示后的第一周,工作人员就接到了好消息。

“同安区和翔安区的厨卫商家纷纷向我们反馈,他们的冰箱和消毒柜销量直线上升,库存一度被清空。”厦门市市场监管局食药协调处处长刘伟程告诉记者,很多家长发现自家孩子报的是C、D级“小饭桌”,纷纷表示要换成更高评级的愿望。

“被评了较低等级的‘小饭桌’坐不住了,自我整改十分积极,根据要求一条条去做。”

刘伟程拿出一张“食品安全动态等级评价表”,上面清晰地标有“硬件条件”“人员管理”和“过程控制”三个标准类目

和11则具体评定项目。“从装潢设备到人员着装,我们都进行了细致要求。”

许燕妮是负责思明区长青段区的协管员,该段区内有17家小饭桌,她会经常与街道、社区网格员一起到“小饭桌”进行检查,并收集菜品留样。

“厦门的‘小饭桌’大多是个体户,在开办初期,食品安全意识较弱,比如食材混放、餐具不合格或加工不过关等。”许燕妮说,“但最近两三年,这些问题基本看不到了。”

“优选托管中心”负责人张雪兰指了指厨房的位置说,“最早协管员一来,就指出我厨卫不分离的问题,眼看着要扣到B级,我赶紧在一周内找来装修师傅改了格局,这才保住了A级。”

记者了解到,厦门每学期约为全市1600家“小饭桌”进行评级,服务覆盖超过6.4万名中小学生。A级占比已从2017年的17%提升至目前的78%。

通过社会共治,厦门借用市场“无形的手”推动“小饭桌”治理快速发展。与此同时,柔性的监管模式也让经营“小饭桌”的个体工商户们收获良多。

曾燕娟是托管机构“九龙学苑”的创始人,她如今经营着6家“小饭桌”。她说:“最早属于无证经营,看见穿制服的就想躲起来。但现在内心充满感谢之情,从帮助办理营业执照,到进行免费食品安全培训,再到疫情之后手把手教我们如何复工复产,一路都有人在帮扶我们。”

2020年,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“政府类十大社会共治优秀案例”,《厦门“五维共治”破解‘小饭桌’治理难题》位列其中。

“小饭桌”治理一直在路上

在思明区万寿路文园的一栋公寓楼里,一家名为“新起点”的“小饭桌”正在营业,将近60名学生在中午放学后来

到这里用餐。

负责人王云霞介绍,从2008年经营到现在,经营规模和用餐学生一直在扩大。在街道的组织下,她在店内安装了8个监控探头,现在相关监管人员可以在网上实时了解后厨的人员操作、环境卫生等情况。

“我们当前正通过推广‘互联网+明厨亮灶’模式,除了监管部门、学生、家长也能通过手机软件,在线上实时了解‘小饭桌’的动态。”饶满华说。

2022年8月,厦门市政府发布了新的关于“小饭桌”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,对各项目责任主体进行进一步明确,细化分工抓落实:如街(镇)需将“小饭桌”纳入网格化管理,建立相应完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;教育部门需组织中小学定期开展“小饭桌”巡查,加强对学生、家长的食品安全宣传培训工作等。

周艺雄是厦门实验小学集美分校副校长,今年秋季开学前,他和街道、社区、市场监管等方面配合,走访排查了校园周边的16家“小饭桌”。“我们学校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参与校外托管,对于‘小饭桌’,之前我们主要管食品安全,但其实它涉及消防安全、卫生安全等。新通知发布后,我们学校也就更有‘底气’和不同的部门一起把‘小饭桌’管起来了。”

饶满华告诉记者,国家推行“双减”及课后延时服务政策客观上对校外托管机构造成一定影响,但由于部分学校整体供餐能力不够充分,目前校外托管机构仍有一定市场需求。

“对‘小饭桌’食品安全加强管理仍是必要的,也是我们的责任。”饶满华将两份相隔五年的《通知》摆在一起,语气中透露着坚定。

“从‘九龙治水’到‘攥指成拳’,我们推动‘小饭桌’治理初步取得成效;但‘小饭桌’事关孩子们的安全与健康,一刻也不能马虎,‘小饭桌’治理也永远在路上。”饶满华说。

(本报记者洪雁)

创新集群能力正加快提升,抢抓数字经济新赛道和主赛道,聚焦重点产业领域,坚持以集群形态推动创新,努力打造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。G60是协同联动的平台,是优势互补的平台,是要素对接的平台,是资源共享的平台,苏州的发展从这个平台中受益,也致力于为这个平台作出更大的贡献。”

“高协同”驱动“高质量”

从创新平台共建、科研资源共享、关键技术共研、成果转化共投等方面探索构建科技协同创新体系,在建立面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方面做出了示范性探索,共同推进科技自立自强。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的报告指出,G60城市群创新发展指数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群,协同发展指数已成为国内城市群典范。

6年来,G60科创走廊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,从要素流通一体化、人才交流无缝化,进一步迈向机制创新接轨化。

G60科创走廊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了长三角“一网通办”试点机制,实现九城市89个综合服务通办专窗全覆盖,跨区域可办理事项数量已经超过178项,跨区域办件累计突破100万件,大幅提高科创要素流动和配置效率;集聚省级以上产业创新中心31家,16个长三角城市在松江设立“产业协同创新中心”;九城市轮值举办G60人才峰会,成立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发展联盟,出台互认互通人才18条政策,实施“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百万科创人才工程”,已集聚各类高层次人才、专业技能人才超1190万人,院士工作站652个,博士后流动站913个。

高协同联动带来高质量发展。今年以来,G60九城市经济呈“V形”反弹,彰显逆境下强大韧性和高成长性。6月以来,九城市签约落地项目超1300个,总投资额逾1.26万亿元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蒲慕明说:“G60的脑智科创基地建成以来,我们已经在脑认知的原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。如今这里吸引了更多的国际团队加入。长三角地区成为各界英才施展才华、创新创造、成就事业的舞台。”

上海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吴清表示,G60科创走廊是长三角区域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,也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兄弟城市的协作,推动G60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,当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创新的先行者、引领者。

新华社武汉/日内瓦11月8日电(记者张淼、熊琦、刘曲)从湿地保护融入城市发展的典范——武汉东湖与青山江滩,到维系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“中华水塔”三江源,再到候鸟迁徙的平安家园鄱阳湖……湿地之美,成为美丽中国的一张张名片。

《湿地公约》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部级高级别会议6日正式通过“武汉宣言”,展示共同守护“地球之肾”的全球意愿,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。多国专家学者表示,中国湿地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背后,是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式生态“密码”,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与经验。

守护中国湿地之美

守护湿地,既是维护生物多样性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,也是中国守护“青山绿水”的美丽诠释和生动实践。

1992年,中国正式加入《湿地公约》,成为第67个缔约方。30年来,中国一步一个脚印,打造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湿地“名片”。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介绍,中国近十年新增和修复湿地80多万亩,现有国际重要湿地64处,中国有13处入选“国际湿地城市”,是全球入选“国际湿地城市”数量最多的国家。中国以全球4%的湿地,满足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对湿地生产、生活、生态和文化的需求。

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学学者巴勒什·多斯特表示,作为《湿地公约》缔约方,中国过去十年所恢复、修复和新增的湿地,无论从面积还是规模来说都是了不起的成就,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。

中国加入《湿地公约》以来,认真履行公约责任,积极参与国际交流,与各缔约方广泛合作,为42个发展中国家的湿地管理人员开展了培训。

“武汉宣言”通过后,《湿地公约》秘书长穆松达·蒙巴说:“30年的时间并不短,我们目睹了中国在湿地保护方面的领导力。从中国过去30年取得的湿地保护成就、设立的目标和湿地管理方式来看,我们可以学习的有很多,不仅是科学方法,还包括空间布局方案和立法框架等,相关经验有助于促进全球形成合力。”

保护湿地的中国路径

湿地,在中国古代有“薮”“泽”“海”等称法。《诗经》中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的诗句描绘的就是湿地景色,体现了中国古人用诗意的眼光看待湿地。具有悠久历史的桑基鱼塘、蔗基鱼塘等中国传统湿地保护和利用方式,至今仍在发光发热。

近年来,中国将湿地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,逐步建立和完善湿地保护法律制度,健全湿地保护管理与调查监测等体系,增强科技支撑能力,走出一条可供世界借鉴的湿地保护与发展之路。

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卢伦燕表示,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》今年6月正式施行,中国从立法和行政管理角度给予湿地重要的保护地位,相关政府部门专门设立湿地管理司。这些举措世界少有,是可以被各国借鉴的中国经验。

此外,中国进行湿地监测信息化建设、搭建智慧湿地管理平台等创新性保护技术与手段,以及在小微湿地概念与实践方面的探索,也为各国湿地保护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。

在本届缔约方大会武汉主会场,法国驻武汉总领事胡建谊对新华社记者说,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,这一理念越来越被全世界接受。希望各国都重视对湿地的保护和修复,让湿地为全世界人民造福。

生态“密码”启迪世界

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,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,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,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。

过去十年,中国把生态保护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,深入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,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发展奇迹,有力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。中国也不断用实践展现大国责任,推动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与进程。

今年9月,中方向联合国赠送了全球耕地、森林覆盖等6套全球可持续发展数据产品,为各国更好实现粮食安全、陆地生态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数据支持。

《湿地公约》秘书处科学与政策总监耶尔克·塔梅兰德说,中国制定了强有力的湿地政策框架,例如中国2020年到2025年的红树林保护修复计划包含非常具体的目标,显示出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技术领导力。中国在湿地保护方面有很多正在分享并可以持续分享的经验,例如可以通过南南合作等机制将自己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分享。

曾考察过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治沙经验的肯尼亚学者卡文斯·阿德希尔表示,在过去十年,中国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,其成功取决于政策支持、市场参与、科技创新等多个方面。他说,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与实践真正抓住了环境保护的本质,对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。



▲这是山东省济宁市惠河湿地景色(无人机照片,11月11日摄)。新华社发(吕光社摄)